

徐森玉先生与京师图书馆

——以俞泽箴日记资料为中心

孙玉蓉

内容摘要:20世纪20年代,徐森玉先生曾在京师图书馆工作过,而留下的文字记载却不多。在他同事俞泽箴的日记手稿中,有关于徐森玉先生在此期间主持擘画、奔走操劳的片断的文字记载。为保护馆藏善本及《四库全书》,为扩充馆址,为应对“国立京师图书馆”的风波以及诸多馆务工作,徐森玉克服重重困难,躬亲其事,恪尽职守。以俞泽箴日记手稿中的记载为基础,与现存相关文献史料相参证,借以证明日记记述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可靠性,从中看到徐森玉先生为京师图书馆事业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徐森玉 京师图书馆 俞泽箴 日记

2019年《文献》杂志第1期发表柳向春博士的论文《徐森玉先生与北平图书馆》,拜读后深受启发,联想到曾在俞泽箴先生的日记手稿中,读到有关徐森玉^①先生在京师图书馆^②工作期间的一些记载,现撮要简述如下,以供读者与研究者参考。

俞泽箴(1875-1926),原名俞箴墀,字丹石,号德孟,浙江德清人,是晚清学者俞樾的侄孙。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曾任无锡竞志学校教员、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等。1919年8月,他只身北上,与清史馆协修俞陛云、北京大学教授俞同奎等堂兄弟相聚于北京。自1919年11月至1926年7月,他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曾任“舆图与唐人写经部”主任,同时也参与处理许多馆务工作。他的日记始于1920年2月26日,终止于1926年7月30日,数日后他在北京病逝。他的日记手稿,由他的堂侄俞平伯一家几经

^①徐森玉(1881-1971),名鸿宝,字森玉。祖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因此,俞泽箴称其为“同乡”。在俞泽箴日记中,徐森玉、徐主任、森玉、吴兴、主任等称谓兼而用之。

^②作为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曾数度更名。因俞泽箴任职期间,该馆均作此名,故本文从之。

周折,保存至今。

一、徐森玉“来馆就职”的记载

20世纪20年代,徐森玉曾两次出任京师图书馆主任,第一次是1922年2月15日,由教育总长齐耀珊^①签署教育部委任令:“兹派本部佥事徐鸿宝为京师图书馆主任,仰即遵照。”^②同年2月16日,俞泽箴日记中就记载了:“今日部中来训令,派同乡徐森玉来主任馆事。”2月18日,俞泽箴又记下了:“徐主任来馆就职,上午开欢迎会。”1922年7月,徐森玉辞去京师图书馆主任一职。在俞泽箴1922年7月22日的日记中,有“徐森玉主任辞职,继任为怀宁洪芑舂^③”的记载。

徐森玉第二次出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工作是在1924年2月。在俞泽箴1924年1月31日的日记中,就有“长沙去职,仍由吴兴来任主任”的记载。“长沙”指章勤士,字陶严,湖南长沙人,故以籍贯代称。章勤士曾于1922年12月至1924年1月,出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吴兴”指徐森玉,同样是以籍贯代称。1924年2月2日,俞泽箴日记中有“森玉主任来馆就职”的记载。

二、徐森玉在京师图书馆所经历的事件

自1918年1月始,教育部为节省经费,决定由教育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不领兼职薪金。1924年11月28日,教育部再发训令,重申京师图书馆馆长由教育次长兼任,并特别指出“现在部款支绌万分,所有该馆馆长一职,毋庸特设,仍由次长兼任”^④。王祖彝在《京师图书馆回顾录》中说:“馆长既为次长兼职,势不能常莅馆,而主任实膺主司之责。”^⑤由此可知,徐森玉主任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期间,在经费短缺,常常数月发不了薪金的情况下,“百计维持,躬亲巨细”,“苦心孤诣,奋力支撑”^⑥的艰难。

①齐耀珊(1865-1946),字照岩,出生于山东省昌邑市齐西村。1921年12月任农商总长兼署教育总长,1922年4月免去教育总长兼职。

②柳向春:《徐森玉先生与北平图书馆》,《文献》2019年第1期,第4页。

③洪芑舂(1885-?),名逵,字芑舂,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1922年7月至9月任京师图书馆主任。

④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05页。

⑤《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下册,第1209页。

⑥王祖彝:《京师图书馆回顾录》,《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下册,第1213、1215页。

(一)读者涂抹和盗窃善本书事件

徐森玉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期间,曾经历了学生涂抹珍本古籍和大学生偷走善本书这两个事件。

第一件事发生在1922年。俞泽箴1922年8月4日的日记曰:

森玉主任任内,有蜀籍学生彭佛远者来馆阅书,于四库本《潜夫论》后,用墨笔批一二十字,森玉主任拟究办,会去任,不果。芟舂主任接任后,奉部令根究其事,日前向检查厅申诉,今日检查此案,馆中命四库司库李耀南^①、特别阅览室收发袁坚^②为代表,中夜始归,言证据极充足,唯检查官囑和解。彭佛远亦来,乞援于子年^③。

可知因为徐森玉主任辞职,此事便由后任洪芟舂主任根据教育部指令做了处理。

第二件事发生在1925年9月4日,北京某大学的学生李俊在图书馆阅览室阅读善本书籍时,趁值班人员不备,将宋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一部窃走。该书为苏东坡晚年所作的追和陶渊明的诗作,十分珍贵。傍晚,当值班人员发现书不见时,李俊已离开图书馆多时。此事的发生,令值班人员大惊失色,立即打电话向徐森玉主任报告。徐主任即刻赶到馆里,派人四处查找,终无所获。于是,速以公函上报警署。署长于午夜时分才派人来履行勘查任务,直查到凌晨两点。俞泽箴日记对此事记述得简洁真切:

今日有自称李俊者,在阅览室窃去宋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一部,傍晚,始行觉察,人去已久。收发处轮应谭志贤^④值日。事发,以电话速森玉来,侦骑四出,卒无所获。作一公函,报告内左三区警署,署长于十二时后派本区区官及一巡长来履勘,扰扰至二时许始就寝。

次日,俞泽箴日记又写道:

晨起,森玉即来,续派人至隆福寺、琉璃厂一带访查,始知此贼昨夜已携书至厂肆求售。续函外右一区,遣派干练巡士协同踪缉。以琉璃厂属内右一区也。并函请北大舍监胡墨青侦查学生。

后证实“窃书者确是某大学学生”。到9月6日,徐森玉“主任来,知所失之

①李耀南,字照亭。1917年6月至1948年12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在俞泽箴日记中,李耀南、照亭等兼而用之。

②袁坚,字少修。1921年4月至1923年12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③即史锡永,字子年。1921年2月至1922年7月和1923年1月至1925年在京师图书馆工作。在俞泽箴日记中,子年、史子年等兼而用之。

④即谭新嘉,字志贤。1917年9月开始在京师图书馆工作。在俞泽箴日记中,谭志贤、谭新嘉、志贤、谭志闲等兼而用之。

书已由李木斋^①先生在文德堂得有确实消息。文德堂主人韩逢源向来收买此项货物,鉴别颇精,且与诸收藏家有密切关系。木斋初拟以假支票购之,后惧不能集事,且韩某之罪仅为收买赃物,并无伙同窃盗情事,亦无应得之罪,只能设法用钱赎回”。徐森玉主任的业师李盛铎建议设法用钱赎书,可是,当时的京师图书馆资金十分紧缺,连工资都不能保证按时发放。关键时刻,幸得傅增湘^②先生相助,慷慨解囊,以300元钱从文德堂代为赎回所丢之书,为京师图书馆解了燃眉之急。俞泽箴在9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午间闻森玉言,所失之书已由沅叔以三百金向文德堂代为赎回。”

1925年9月10日,俞泽箴日记写道:

草呈报窃书复获详细情形呈文一函,请内左三区警署严行踩缉自称四川学生李俊少年。森玉来,商量取赎所失之书事。今日《顺天时报》载失书事,有监守自盗字样,作函致报社总编辑,加以更正。即督同丽棠^③等书之,又为森玉撰一处分馆员手折稿,命星槎^④誊真,即打包封交星槎,径送森玉。”

9月11日,《顺天时报》刊发了京师图书馆的更正声明。

随后,徐森玉主任又为偿还赎书款的事费了心思。经过研究,他们决定由出事当日的轮值收发人员谭新嘉、邓高镜^⑤分摊赔偿300元,对执行收发遗失出门证的录事李堃^⑥停职或记大过一次。徐森玉将处分馆员的意见,连同宋刊本失窃复获的呈文以及赎回的善本书,一并报请教育部审核。1925年9月29日,由教育总长章士钊^⑦签署的关于处分善本书被窃有关人员的《教育部指令第1636号》连同审核过的善本书,一同发回京师图书馆。教育部指令称:“此次该馆赎回书籍之费,应即如所请,由馆员谭新嘉、邓高镜二员分摊赔偿,录事李堃应即停职。”对于赎回的“宋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一册”,教育部也予以认真审核,承认“确系原书,惟缺第二卷第八页一

①即李盛铎(1858-1937),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

②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校勘学家。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曾任教育总长。

③即张树华,字丽棠。1924年5月至1927年8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④即叶贵源,字星槎。1925年5月开始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⑤邓高镜,字博诚。1921年4月至1925年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⑥李堃,字舜人。1921年9月至1925年9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名录》(见《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下册)中,写为“李坤”。

⑦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1925年4月至1926年,曾任教育总长。

页,应速行觅得,以补足之。原书即行发还该馆,妥慎庋藏”^①。教育部要求京师图书馆接受教训,加强管理,切毋再出疏漏。

俞泽箴在日记中,连夜晚发生的事情都能够完整清晰地予以记载,那是因为他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期间,一直居住在馆里,他的家眷没有随迁到北京。

(二)协助浙江省教育厅补抄《四库全书》

1923年底,浙江省教育厅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拟以京师图书馆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校录、补抄浙江图书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所残缺的二千七百馀卷。因为该省连年灾荒,难以筹得公款,于是,浙江省教育厅向本省绅商筹募资金,募集到现金一万馀元。并“委派秘书堵福洗^②至京督饬写生校讎写本”,希望得到教育部的支持。为此,1923年12月14日,教育部特发训令第230号给京师图书馆,令该馆“允浙江教育厅补抄《四库全书》”,并同意变通原有的“借抄四库书者,每册收费半元”的规定,对其“豁免征收抄费”,以期成全地方公益事业^③。

遵照教育部训令所说,徐森玉主任便与浙江省教育厅所派人员进行接洽,协调办理抄书事宜。1924年2月17日,俞泽箴日记中有:

午后,堵申父来接洽文澜阁补抄《四库》事。

3月4日晚:

森玉为浙江抄书事,设宴煤市桥北泰丰楼,为申父等介绍,专宴北海^④、介卿^⑤、羽逵^⑥、伯良^⑦、舜人、申父等六人,志贤、任父^⑧及余作陪。徐森玉主任以宴请的方式,为浙江代表堵福洗引见了京师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为愉快合作打开局面。

①《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22—123页。

②堵福洗,字申甫,号屹山,浙江绍兴人。曾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到浙江图书馆工作。其间,受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委派,任监理,于1924年2月至12月,到京师图书馆督理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事。在俞泽箴的日记中,堵申父、申父、申甫、堵屹山等兼而用之。

③《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01—104页。

④即孙初超,字北海,山东文登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分部人员,1916年10月至1923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⑤即杨景震,字介卿。1917年1月至1925年12月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⑥即黄顺鸿,字汝奎(俞泽箴日记中写为“羽逵”)。1923年5月至1926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⑦即杨伯良,字寿祥。1917年7月至1943年4月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⑧即金守淦,字任父,又作壬父。1918年3月至1927年8月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1924年12月11日,浙江省教育厅补抄《四库全书》的事情暂告一段落,俞泽箴日记写道:“森玉为申甫等祖钱,假座泰丰。”12月13日,又写道:“申甫、伯珊移装寓正阳旅馆,将以明日行。”

堵福洗、沈伯珊虽然回到浙江,但是,补抄《四库全书》的事情并没有完结。1925年4月1日,俞泽箴日记有“晚间作一函,致堵屹山,报告四库分架图事”的记载;8月23日,又有“得申甫书,托补抄《四库》百八十一卷”。8月25日上午,“森玉来,商量补钞《四库》事”。下午,按照徐森玉主任的旨意,俞泽箴“函致申甫,言补钞《四库》先决事,厥有数端:(一)期限过促,需宽以时日;(二)辞经理经济事;(三)问询捐赠《道藏》事”。9月16日,俞泽箴“作一函致申甫,报告抄书事,并为京馆托补《金华丛书》”。10月6日,俞泽箴“致申甫一函,述抄书事”。11月2日,俞泽箴“归馆途遇沈伯珊。伯珊自南中来,代表申甫接洽补钞《四库》事,邀返馆中长谈”。11月30日,“午后,绍兴徐益甫(思谦)来,为申甫代表,促补抄《四库》事”。浙江省教育厅补抄《四库全书》的工作,原拟1924年内完成,结果延至1925年11月末,仍未最终结束。

(三)关于影印《四库全书》

徐森玉主任也关注、协调《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事宜,如1924年6月17日,俞泽箴日记写道:“晨起返馆。森玉来,言曹仲珊(今按即曹锟)将印《四库全书》。”时任大总统曹锟曾下令影印《四库全书》,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禁(1926年获释),此事或因此中辍。

1925年,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再次申明影印《四库全书》的重要性,并向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提出申请。1925年9月25日,临时执政府批准章士钊的提议,准备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移沪由商务印书馆影印^①。9月26日,俞泽箴在日记中写道:“闻颂生^②言,森玉晨间来,言商务承印《四库》已定,用文津阁本,而以文渊本归吾馆供展览。”9月27日,俞泽箴遵照徐森玉主任的吩咐,“草请将文渊阁本《四库》移换文津本付印呈文,属星槎缮正,并作一函,托星槎面呈主任”。

1925年10月17日,教育部遵照“临时执政令”,发出“训令第270号”,“令准影印《四库全书》”,命京师图书馆照章执行。教育部训令下发前夕,京师图书馆已经开始行动。同年10月15日,俞泽箴在日记中写道:“归馆,在

^①《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24—125页。

^②即龔汝儔,字颂生,四川宜宾人。1919年3月开始在京师图书馆工作,至1949年秋仍在馆内任职。

扁担胡同遇森玉,知馆中《四库》书定明日发运赴沪,已派任父、照亭、寅斋^①经理发书事。”10月16日,“商务印书馆孙伯恒^②、李拔可^③来查点《四库》,预备装箱。森玉亦来”。

但是到了10月19日,形势发生了变化。俞泽箴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报载,浙军已入常州,奉军退守镇江。《顺天时报》谓孙馨远^④受赤俄百万金卢布,遂首先发难。一星之火,或将燎原。南望殊恻也。”10月20日,“报载杨宇霆^⑤已退江北,陈调元^⑥留守南京,沪宁路已断。”故10月21日,教育部又发来训令称:“铁路道梗,暂停发运《四库全书》。”10月22日午后,俞泽箴“为馆中与商务拟一运还《四库》合同稿,稿成,交星槎送呈主任检定之”。此后,俞泽箴日记中就再无关于影印《四库全书》的记载了。

(四) 申请官地扩充图书馆址

徐森玉主任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期间,曾为扩充馆址而尽力奔波。1924年5月6日,俞泽箴日记中就记载了:“馆长来,言中央有建筑图书馆之意,地址已择定参谋部东首操场,直达北海西岸,迁养蜂夹道于西属。”馆长要求“量取全馆书籍体积。傍晚,量善本、《四库》两处”。此后便无下文了。

直到1925年1月31日,徐森玉主任让俞泽箴代拟报告,申请馆舍。俞泽箴在日记中写道:“森玉来,言美专已解散,教部决行停办,拟请教部拨校舍全部予本馆作总馆,而以方家胡同之馆作第一分馆,属予草呈文。”2月1日,俞泽箴代徐森玉主任写好呈送教育总长,请提交阁议,拨给北海西岸官地为京师图书馆馆址的报告^⑦,当晚,俞泽箴“访森玉,请其核呈文稿”。此申请报告呈送教育总长后,未有回音。

1925年5月12日晚,俞泽箴“得森玉电话,以北海开放作为公园,命拟

①即吴德亮,字寅斋。1917年1月至1926年2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在俞泽箴日记中,寅斋、吴寅斋等兼而用之。

②即孙壮(1879-?),字伯恒,北京人。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

③即李宜龚(1876-1952),字拔可,福建闽县人。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

④即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1925年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同年11月,被吴佩孚任命为江苏都督。

⑤杨宇霆(1885-1929),字邻葛,祖籍宋道口镇代岭村,出生于奉天法库(今沈阳市法库县)。系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之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被任命为江苏军务督办,进入南京。

⑥陈调元(1886-1943),字雪暄,河北安新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1925年升皖军总司令、安徽督办。

⑦报告见《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08-109页。

呈请拨官房作为图书馆”。5月13日,俞泽箴代徐森玉主任完成了呈送教育总长“请拨北海官房作为京师图书馆总馆”的报告^①。5月14日,俞泽箴日记中写道:“森玉来,言沅叔往见芝泉^②执政,为图书馆重申前请拨养蜂夹道官地为馆址。执政已许可,命具手折前往,嘱余主稿。”5月16日,俞泽箴遵命“撰写地手折稿”。7月9日,俞泽箴“草上教长请拨北海西岸官地呈文一,交张丽棠眷真”。7月29日,俞泽箴日记中写道:“森玉来,言教部有允拨清太庙为图书馆之意,迁太庙中神主人宗人府,给代价五万金,不识能成事实否。”8月27日,俞泽箴日记中写道:“森玉来言,馆址业经勘定,在北海西南岸,袁项城^③时模范团操场,南为阳泽门,西邻养蜂夹道,大概可望成功。争持数年,卒底于成,亦森玉奔走之力也。”8月30日,“森玉来言,馆址及建筑费大概可望如愿,唯是否即用阳泽门内地,尚不能预定”。直到1926年4月6日,陆军部给京师图书馆发下用地执照^④,北京西安门内养蜂夹道路东,前演武厅操场地一段计地48亩,房14间,价洋2万圆。在徐森玉主任的不懈努力下,扩大馆址的事情彻底敲定。只是此时此地已经属于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创办的“国立北京图书馆”所有。1926年5月9日,《晨报》刊登“京师图书馆将大兴土木”的新闻,徐森玉主任“恐滋误会”,5月15日,嘱俞泽箴“去函更正”。此事告一段落。

(五)应对“国立京师图书馆”风波

1925年9月2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与教育部协商,拟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⑤十条,由双方签字通过。契约的有效期限暂定为十年。根据契约第一条的规定,“国立京师图书馆”的管理权,属于教育部与“中基会”共同组织的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共九人,教育部与“中基会”各出代表三人,双方合推三人,共同“主持一切进行事宜”,并将教育部所属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此事在俞泽箴1925年11月8日的日记中有所记述: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近与教育部订立契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以原图书馆书籍移交两机关,合组委员会,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拨款百万元,作为建筑费,经常费则各任其半。新馆未建筑成功

^①报告见《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19-121页。

^②即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24年11月,临时政府成立,出任临时执政。

^③即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又作慰廷,河南项城人。

^④《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46页。

^⑤《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下册,第1027-1030页。

之前,由该会出资七千元,暂租琼岛西部普安圣果等四殿及悦心殿、庆霄楼等处,作为临时图书总馆。预计年内迁入。

1925年11月上旬,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根据契约第五条第二款“向教育部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提出关于馆长及副馆长之任免而征其同意”的规定,推荐聘请梁启超、李四光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正、副馆长。12月2日,由教育总长章士钊签署的“关于聘梁启超、李四光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正副馆长”的教育部训令第313号正式送达京师图书馆。

在教育部训令送达之前,梁、李二人已经走马上任。在俞泽箴1925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就有:“午后,新任馆长梁任公、副馆长李四光偕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诸委员均到,向各课周视一周而去。”在12月1日的日记中,又有午后李四光副馆长再次到馆了解情况的记载。

自从得知教育部与“中基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并聘请新馆长之后,京师图书馆的员工就对增派新领导产生了抵触情绪。自1918年起,教育部为节省开支,一直由教育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而由“主任实膺主司之责”。当时,正是徐森玉主任主持馆务工作期间,他对新馆长的到来也同样感觉不适应。俞泽箴日记记载:

归闻森玉来,以委员会有解散图书馆策略,拟赴清华向任公力争……(晚)十时许,至森玉处,访问谈判结果,始知任公定馆章,设会计、庶务、文牍三主任,直隶馆长下,旧同事无一可保全者。馆长、副馆长薪月千一百元。森玉大愤,有辞执行委员,退就京师图书馆主任,据理力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意。属返征同人意见。(1925年12月5日)

晨起返馆……遍谒同僚,以森玉意告之,均愿一致为森玉后盾。(1925年12月6日)

晨,森玉来,言委员长范静生^①、次长陈任中^②、副馆长李四光将于午后来馆,宣布改组方法……二时开会。范静生备陈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教部订立契约,合办图书馆之经过。次又报告举定委员由委员会票选,梁、李二馆长力图刷新馆中经费,并未明定数目,唯馆长薪俸,则以对外表示隆崇之意,已定千一百金(正六百、副五百),馆员应用有图

^①即范源濂(1876-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曾任教育总长。1924年9月18日,任新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临时会长。1925年6月,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年会上,当选为干事长。1925年11月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代馆长。1925年12月,任中华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②陈任中(1874-1945),字仲骞,江西赣州人。1925年6月30日,以教育部参事兼代次长职,同年8月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书馆学识之人,旧馆员茹苦多年,亦思借重,唯以经费需用以购书,薪水一项不能过丰。口吻间颇多轻眇之语,且谓馆长为便利进行起见,对于各人职务上当有重新改编之事。次由李四光发表图书馆应行振刷意见,而若何改组则不题一字。余等本思作答,而范、陈已起立行矣,不得已,公推照亭向李副馆长诘问,照亭不善措词,语多紊乱,加以谭志闲、吴寅斋别有肺腑,相继发言,遂致一无结果而散。(1925年12月12日)

晨,访森玉长谈。森玉对于馆中人罔知大体,颇致不悦。(1925年12月14日)

京师图书馆员工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一是员工与馆长的薪俸相差悬殊。京师图书馆员工的工资一向比较低,截至1925年2月,“全馆之人,月薪逾百元者仅有一人,满九十元者仅有二人,其余则最多不过七十三元,且有二十元者”^①。当时中央财政紧缺,教育部所属单位欠薪严重。而新聘正、副馆长的薪俸却高达600元和500元,报酬如此悬殊,让员工无法接受。二是新馆长上任后,拟对原馆进行改组,员工的职务重新编制,许多人的“饭碗”难保,因此,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也就难免了。

1926年初,因时局艰难,财政支绌,教育部申请不到经费,无法按照契约规定履行无偿拨地为新馆址之事,也拿不出每月应该支付的经费;另外,要求教育部将京师图书馆所有图书“完全移交委员会处理”,在当时也难以实施。于是,1926年2月24日,“中基会”致教育部教育总长函,“声明在教育部未能履行各项条件以前,本会前与教育部所订关于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十条,应即暂缓实行”^②。随后,“中基会”又致函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告知该会职权“暂时中止”。3月4日,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致函梁启超、李四光正、副馆长,谓“此次创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实以教育部与基金会所订契约为根据,目下此项契约既经从缓实行,一切馆务亦应同时停止”^③。所以俞泽箴在同日的《日记》中,有“今日得国立京师图书馆函,该馆暂行停止进行,此亦在意计中者”的记载。

1926年3月,由“中基会”创办的“国立北京图书馆”成立,馆址在北海公园庆霄楼,“仍以梁、李二公为正、副馆长”。此后,梁启超、李四光就不再过问京师图书馆的工作。1926年8月20日,梁启超在致教育总长任可澄^④、

①《1925年2月呈教育总长陈京师图书馆困难情形(抄件)》,《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13页。

②《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40页。

③《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44—145页。

④任可澄(1878—1946),字志清,贵州普定人。1926年6月出任教育总长。

教育次长胡石青^①的信中,曾谈到:“前有一书,言国立京师图书馆事,想已达。此馆馆长名义至今仍我尸之,然因部中无力履行契约,文化基金董事会所拨经费不能供新旧两馆之需,故方家胡同旧馆,仆事实上并未接收,仍由部中原派主任徐君主持。”^②这里所说的“部中原派主任徐君”,即指徐森玉先生。京师图书馆被改名“国立京师图书馆”的风波,至此终结。

(六)保护馆藏

教育部直辖之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珍藏着大批贵重图书,由清内阁大库移藏的善本约有三万馀册,内有永乐大典八十馀册;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八千馀卷;文津阁《四库全书》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三百册,完全无缺。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曾评价京师图书馆,“实可称为研究国学者一比较完善的图书馆”^③。

对于这样的藏书重地,1926年初,曾发生教育部部员以京师图书馆所藏善本和《四库全书》抵押索薪事件。1926年1月5日,俞泽箴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教育部部员开索薪大会,议决将本馆善本《四库》一律移入教部,由索薪会中人共同保管。图书馆委员馆如需迁入北海,需先行纳款取赎。上灯后,执行委员罗普、崇岱、谭孔新、庄恩祥、俞蔚芬、孙家骧、叶润猷、谢冰、陈荣镜、王守兑、茅介寿等十一人来,出会中公函,索取书籍,势颇恟恟。因招森玉来,再四开导,仅取去《善本目录》二册,《四库简明目录》十二册。险矣!

俞泽箴记述得十分真切,幸亏徐森玉主任镇定自若,“再四开导”,力挽狂澜,方得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次日,徐森玉主任便将此事报告给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1926年1月13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致教育部要求履行十条契约的函中,提及了此事。

在“中基会”与教育部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中,要求将原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全部移交给“国立京师图书馆”,移至新租定的北海公园内的多间房屋中,“以便保存兼供阅览”。此事尚未实施,便发生了教育部部员据书索薪事件,引起“中基会”的担忧,他们在致教育部的信函中说:“据一月六日徐委员鸿宝在图书馆委员会报告,贵部部员因欠薪关系,曾往该馆旧址声明,此项图书应作还偿欠薪担保之用,并将重要书目取去保存。此事发生以

^①胡石青(1880-1941),河南开封通许县人。1926年出任教育次长。

^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第580页。

^③《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285页。

后,将来移交图书时是否别无他项困难?”^①

数年后,王祖彝在《京师图书馆回顾录》中,也谈到当年封存库书、抵押索薪之事;并特别提及当时“中央各部署财、交、农、商”“外部”“法部”“陆海军”等处多能维持,“惟教部及所属经费积欠累二十馀月之久”^②,足见维持文化事业之艰难。

(七)馆务工作种种

徐森玉主任主持京师图书馆工作期间,为应对琐碎的馆务工作,他殚精竭虑,奋力支撑。

为充实馆藏访求古籍。如1924年4月11日,俞泽箴日记中有:“今日,森玉主任来自房山,言房山左近石经为曹三取去。古迹就湮,殊可惋惜。”又如1925年3月26日,俞泽箴日记写道:“返馆森玉已到。拟请拨国务院所藏杨守敬书籍手折稿并其他文稿二件。傍晚,亲交丽棠缮写。”此事虽经努力,仍未争取成功。后来,国务院所藏杨守敬书籍并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再后来这批书被运到了台湾^③。

拟呈教育部文件。1924年9月16日,俞泽箴应徐森玉主任委托,“造本馆职员到馆日期、职务、薪俸表一纸,送部。”9月30日,俞泽箴日记中又有:“森玉来,言膺白总长^④又有裁员之意,将亲来视察,属造履历表一册。”10月2日,“森玉来,命草请维持本馆手折稿”。随着教育总长的不断更替,拟呈教育部文件的工作也未有穷期。1925年3月24日,俞泽箴日记中写道:“以新总长到任,草手折一,报告馆中窘状,造职员名单。”俞泽箴代徐森玉主任所拟呈送新教育总长王九龄^⑤,胪陈京师图书馆困难情形,请妥筹维持馆务经费的文件手稿,已被收入《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⑥中。随后,1925年4月1日,俞泽箴“拟请临时费四百元手折稿”。6月26日,“森玉来,为庚款事,属主稿至委员会请款”。6月30日,“草向庚款委员会请款意见书”。10月23日,“造图籍分表、职员表、经费支出简表,备送庚款委员会”。1926年5月8日,“森玉来,拟上教部振顿本馆呈文一件”。

①《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35页。

②《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下册,第1212—1213页。

③参见《蒋复璁悼念袁同礼》,《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下册,第1331页。

④即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23年9月至1924年1月和1924年9月至11月,曾任教育总长。

⑤王九龄(1880—1951),字竹村,云南省云龙县石门镇人。1925年3月任执政府教育总长,4月底离职。

⑥《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上册,第110—118页。

馆中工作人员的人事变动。如1924年10月12日，“森玉来，令治于政^①解职。普通收发书籍处，拟由馆中同人轮值”。

1924年12月26日，“森玉来，拟调寅斋至分馆，寅斋辞不就。午后，又商诸九峰^②，九峰亦不就，遂有调少逸^③之议”。

1925年4月30日，“森玉来，发表子年、子干^④、体仁^⑤改名誉职，咏琴^⑥、卣甫^⑦准予辞职。又发表加薪人名单，余亦得加十元”。

1925年6月6日，“主任来，发表寅斋调四库，照亭调善本，任父调普通，九峰任招待，绍彭^⑧帮庶务，星槎移宿庶务室”。

1926年4月13日，“正午返馆，值森玉于途，言会计、庶务已辞职，无人接受，言下愤愤”。

由于经费短缺，欠薪严重，馆内人员流失，也是让徐森玉主任费心的事。

其他工作。1925年9月27日，京师图书馆一年一度的晒书工作结束。9月28日中午，“森玉设宴相款”参与晒书工作的人员。

1925年10月11日，“返馆，闻森玉来馆相寻”，晚“十时许，至森玉处夜话，为森玉拟一函致闾仙^⑨司长，为史子年索欠薪事”。

1926年3月23日，“森玉来，命拟一通告，重宣夜间门禁。”

带友人来馆参观唐人写经。如1924年9月17日，“午后，森玉偕友人来参观写经”。1925年4月10日，“吕健秋^⑩次长来馆视察……森玉偕李木斋亦至”。1925年8月23日，“森玉偕叶德辉、薛大可^⑪、席启駟^⑫来参观写

①治于政，字衷夫。1920年2月至1924年10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②即范腾端，字九峰。自1920年12月开始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③即王崇周，字少逸。1924年7月至12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④即濮世楨，字子干。1924年5月至1925年4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⑤即范体仁，字宜章。1924年12月至1925年4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⑥即陈应麟，字咏琴。1921年12月至1925年4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⑦即张灿，字卣甫。1922年12月至1925年4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⑧即金毓年，字叔彭（俞泽箴日记写为“绍彭”）。1925年4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不久离职。

⑨即高步瀛（1873-1940），字闾仙，河北霸县人。1915年8月至1926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⑩即吕复（1879-1955），字健秋，河北涿鹿人。1925年3月任教育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⑪薛大可（1881-1960），字子奇，湖南益阳人。辛亥革命后，曾任众议院议员。

⑫席启駟（1869-1966），字鲁思，湖南东安人。现代学者、教授。

经”。1926年3月12日，“森玉、叔平^①来摄取敦煌写经中旋风叶书（即俗称手折式）。此项物品为卷子本化为折叠本之基础”。

赴天津出差的记载。如1925年6月9日，“得森玉书，知以事赴津，二三日后即可返京。”又如1926年5月19日，“森玉来言将赴津，约明日回京。”究竟为何事而赴津，俞泽箴的日记中没有说明，暂时也无从查考。

赴日本参会的记载。1925年10月23日，俞泽箴日记中有：“森玉将之日本赴佛教会，主任有派稻孙^②暂代说。”10月24日，“森玉偕稻孙来。以将赴日本，介绍稻孙也，商量应付国立编译馆调取重复书籍事”。同日晚，俞泽箴“访森玉，则已行矣”。1925年12月2日，徐森玉回到北京。12月3日，俞泽箴日记中写道：“归遇颂生于途，知森玉已归，在馆相俟。急返馆晤之，始知昨日始自津门归，略谈馆中事，匆匆别去。”

三、徐森玉与俞泽箴的私人交往

在徐森玉任京师图书馆主任期间，俞泽箴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帮他草拟了许多呈文、信函等文书。徐森玉对俞泽箴不仅信任，而且给予关照。俞泽箴日记记载1924年3月15日，徐“森玉以所印《北山录》一部见赠”。《北山录》全称为《北山参玄语录》，十卷，中唐神清撰，徐森玉寻访到极难得的“两不全宋本……合之适成完璧”。马叙伦在《读书续记》中说，《北山录》“大体乃类书也，附会三教，而指归于阐佛，辞极朗丽，盖沙门之有文采者也”^③。因此此书十分珍稀，“海内恐无第二本”（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语）^④，因此，1918年末至1919年，徐森玉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书五百册，分赠友人。

因为工资常常不能按时足额发给，俞泽箴生活拮据之时，也曾请徐森玉帮助卖书。如1924年9月2日，“午后，森玉来。度节需钱，以书一部托其出售”。平时，俞泽箴常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外国小说，他翻译的近十万字的《换巢鸾凤记》书稿，就是徐森玉帮助推荐给张元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俞泽箴1925年4月1日的日记中有：“今日森玉为作函致菊生，介绍《换巢鸾凤记》。”1926年7月21日，“商务印书馆已将《换巢鸾凤记》收受，寄来上册

①即马衡（1881-1955），字叔平，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出任古物馆副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等。

②即钱稻孙（1887-1962），字介眉，浙江吴兴人。历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主事、视学、金事等。

③转引自叶笑雪：《徐森玉年谱》手稿影印本，中华书局，2015年，第18页。

④转引自叶笑雪：《徐森玉年谱》手稿影印本，第19页。

稿润百三十元”，俞泽箴托朋友从商务印书馆琉璃厂分馆领回稿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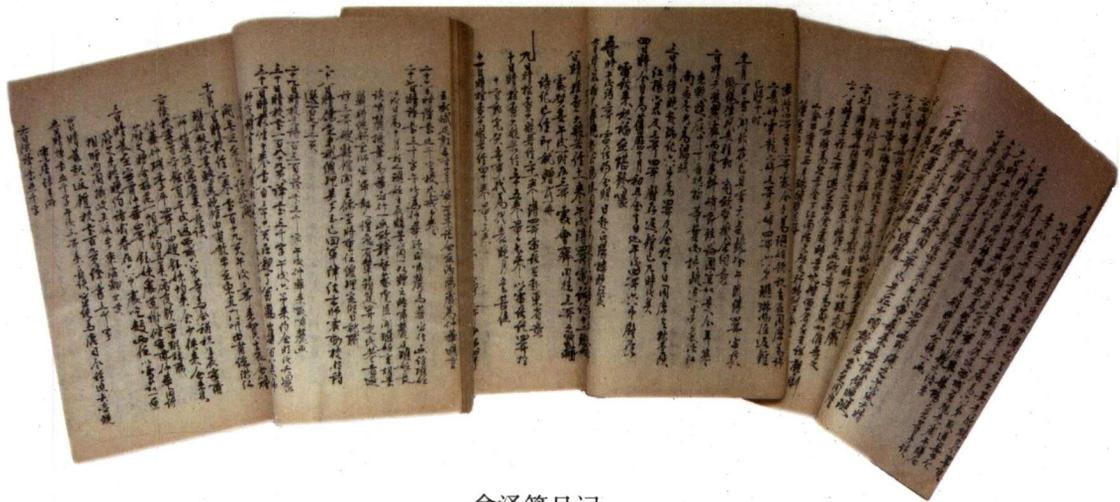
那时，俞泽箴的胃病已经比较严重，时时发作，看了多家医生，一直不能确诊，也一直不见好转。此事也引起徐森玉的重视，1925年8月18日上午，“森玉来，以沉香末一包见诒[贻]，属和烟草吸之，可医气痛。情至可感”。1926年6月24日，“森玉来，以余痰嗽，力劝余就小营^①乞诊，且属马叔平为余介绍。十时许驱车前往，小营断为肋膜炎，以药授余。”俞泽箴患的是胃癌，沈氏的诊断显然是有误的，但是，徐森玉对俞泽箴的关心与爱护却已记录在案。

四、结语

20世纪20年代，曾在京师图书馆工作的俞泽箴先生的日记中，留下徐森玉先生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期间主持擘画、奔走操劳的身影。为保护馆藏善本及《四库全书》，为扩充馆址，为应对“国立京师图书馆”的风波以及众多馆务工作，徐森玉克服重重困难，躬亲其事，恪尽职守。俞泽箴短暂的、片断的记述，丰富了第一手史料，更有助于展现徐森玉先生为京师图书馆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作者简介】孙玉蓉，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已退休）。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①小营，沈钧儒之子沈汝兼，浙江嘉兴人。在北京行医。



俞泽箴日记

详参孙玉蓉《徐森玉先生与京师图书馆》一文

文倬先生著书久未通问而追未忘以
 有端实为今世法理学者第一人也奉
 三月廿八日函方知已福砚杭州益 叩尊
 著精密沈博自忝感薄闻出上以来至今
 始有有确切之评便款喜赉彰有如而
 於友益得借读定学派之陈梦家君早
 已逝世年送给其一读耳 今世法理学者
 我所知者有天津之于鹤年君推已年老多病

任后读论为特寄与彼生同欣赏所惜其
 近未与刊物可发表大作者便中为与刊物
 出版社主特人一商侯武威得商一不重印时或
 小当作载入或以陈氏文改寄现在出版探同说
 情因得院出版口疏推何时能实现此致为雅
 预知但望百多活数年俾不致台端若以抗
 州重蒙清彩喜日百花感用 先生撰学其地
 使我生致诸信为学自重 弟顾颉刚上 五三

顾颉刚致沈文倬信札

详参楼培文